



第六期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编者的话：“树典型”，是古已有之的把戏。

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被表彰了上千年，只有给弱势群体树立个标准，做起君、父、夫、主才稳当，才过瘾。为此，从朝廷到家族绝不吝惜荣誉和财帛，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君不见，为了做典型、学典型，倒悬国门的，举家仰药的，法场换子的，断臂的，从井的，卧冰的，割股的，轰轰烈烈，史不绝书。

卢弘同志讲述的故事，是“树典型”的文革版。名目变了，叫做“活学活用”、“一心为公”、“支左爱民”等等，愚弄大众的本质未变。所以，根据“形势需要”对典型的原型有拔高，有增隐，有编造，甚至丧事当成

军报在“文革”中是怎样塑造“英雄”的？

卢 弘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王 杰

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

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刘英俊

也许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运动全面展开时，黑龙江佳木斯的驻军部队，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英俊的新典型。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确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部队里组织人写出了稿子，要报道这一英勇事迹，并为此与军报进行联系。刘英俊所属部队23军搞报道的同志我都认识，他们来军报后向我说了一些其他情况，说是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认为他为本部队增了光。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负面的东西不仅一点不见，反而被说成是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对于刘英俊的宣传，军报一开始就大搞借题发挥和移花接木。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1966年7月13日，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配发了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题，画着刘英俊拦惊马场面的大幅美术作品。在当日的社论中，军报的“笔杆子”

们在林彪语言的基础上作了新的发挥创造，第一次出现了四句最时髦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认真学习最高指示，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尽管这几句“精彩语言”既不是出自刘英俊口中，更没有出自他的笔下，他生前也根本没听说过也不知道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对他的宣传中，却都强安到这个已逝的年轻战士头上。

军报在对刘英俊的宣传上，真是下了大功夫。从7月13日刘英俊的名字第一天见报，发表第一篇名为评介刘英俊、实是推出四条新口号的社论开始，每天都以一版突出地位和各版整版篇幅，连续发表关于刘英俊的言论、报道、反应文章和刘英俊的手迹、文物及学习他的活动的各种照片图片等等。直到8月10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典型，对刘英俊的宣传才基本收场。所有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刘英俊的事为“载体”，强加进军报本身正极力宣扬的各种最新精神和提法，实际上都是借题发挥甚至别有用心。这种做法早已是军报的“优良传统”，这次仅仅是“发扬光大”而已。

蔡永祥

1966年10月31日，军报又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重大报道，说是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出现了一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报道说，当年10月10日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蔡永祥，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时，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只是蔡永祥也“壮烈地牺牲了！”同天报上发表了军报为蔡永祥写的第一篇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整个11月、12月都是对蔡永祥的先进事迹和向他学习的活动的连续报道。当时照例又选发了蔡永祥的日记及其手迹，那日记手迹当然是挑了又挑精选出来的片断，至于已

喜事办，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典型”中最荒唐的是刘学保。他看到魔术师怀里变出个火盆，就生把火盆往怀里揣。他根本不懂：“组织骗”与“骗组织”是性质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就象“高干子弟行骗”与“冒充高干子弟行骗”的区别。他坏了规矩，所以最终进了班房，而不是干休所。当然，如果文革不结束，这种“英雄”，不知还要英武到何年何月。

真善美，不能靠政权的“树立”，而要靠积极、进步、开明、健康的社会机制下人性正常的升华。

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其

被排成铅字的“日记”，其文字的通顺尤其是思想的敏锐，又富有理论色彩和指导意义，显然并非完全出自一个普通战士笔下。

“文革”以后，我曾到过仍驻在钱塘江大桥头的蔡永祥所在连队。那里不仅建有蔡永祥的“英雄塑像”，还有一座纪念馆，里面全是对蔡永祥事迹、生平的介绍，陈列着他的日记、文物等等，还有全军全国学习、纪念蔡永祥的活动报道和照片，当然更有军报对他的宣传评价。不过我去时这个纪念馆早已封闭了。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来当时那个对“文革”运动“怀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铁路轨道上放上大木头的“阶级敌人”一直没有找到，连那个“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事件发生时正是凌晨，在场的只有蔡永祥一个值勤战士，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上坐的都是红卫兵、那火车后来又按时“顺利通过”？蔡永祥的英雄行为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发现和被确认的？他当时推断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是无从查究的“无头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吕祥璧 李文忠 门合

对蔡永祥的宣传到1966年底才停息，紧接着1967年春季又出现了一个“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因此他将像“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亿万人民。”引号中的话都引自军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这一社论的标题就是后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论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说吕祥璧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说他“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等等。不幸的战士吕祥璧，成为不到一年内的第三个被军报宣传

所利用的牺牲者。

吕祥璧抢救红卫兵的事才过去几个月，江西又出了个事故。一批红卫兵正过一条江时，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队赶去抢救。有一个叫李文忠的战士，在抢救红卫兵时溺水牺牲了，这当然又成了英雄。军报很快为他掀起了又一个宣传热潮，连续发表社论和消息，将李文忠树为“支左爱民”模范，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概括出几句顺口溜式的新口号，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宣传李文忠两个多月后，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叫门合的部队基层干部，他在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防霜冻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在炸药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在场的群众。军报将门合宣传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又说他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上面引述的这句话，是当时由军报“笔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论家”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据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的新提法，远在西北地区基层工作从不接触理论研究的门合，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刘学保

在军报当时宣传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个一直活在人世间，他就是 1968 年 4 月 24 日见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当天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

通讯中介绍说，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结果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 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时，他就一边祷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得讯赶来时，刘学保“微笑”着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军报所宣传的“英雄人物”来看，刘学保的事迹格外富有戏剧色彩。事实上，它真的是一部纯属虚构的，由他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闹剧、惨剧。刘学保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一个卑鄙恶劣的政治骗子，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事实真相是，1967 年 12 月 17 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连砍几斧后又用尖刀往要害处连扎几下，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

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搏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进了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然而历史无情人心是镜，天网恢恢法理难容。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许多干部群众都曾公开表示，说李世白企图炸桥没有证据，刘学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军报也收到了认为刘学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读者来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这事才被重新提起。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

军报“文革”十年的忠实记录

——推介卢弘大著《军报内部消息》

王年一

我久久盼望的好书出现了。这就是卢弘先生写的《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中国人写“文革”十年回忆录，这是第一本。徐景贤写过一本《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2 月出版），但只写了十年中的若干片断，卢著写了十年，与它不同。

这本书是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赠我的。我得此书，有极大的欢喜。拜读时，我随着其中的内容心潮澎湃，时而忧愁，时而愤怒，时而开怀一笑，时而怒不可遏，几次眼含热泪，以致老伴劝我不要过于激动，免生意外。读完全书，我仿佛又做了一场噩梦，冷静下来，掩卷叹息。中国人一千个一万个不应该忘记那十年浩劫啊！

卢弘先生经历不凡。卢弘，又名洪炉，原姓郭。江苏泰兴人，1931 年出生，1944 年十三岁时参加新四军，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从事部队宣传、文化、新闻工作的 50 年中，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近 30 年。他是画家、作家，创作过大量美术作品，又创作过许多传记、报告文学、小说和电视剧本，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还曾创办和主编过中国著名的刊物《炎黄春秋》。这样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却在军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军籍并押送回乡劳动改造。他对中国人民诅咒的“文革”有切肤之痛、刻骨之恨。他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研究有关资料，又用两年时间呕心沥血写成此书，各方都不接受，不给出版，他愤而以“该杀该剐，豁出去了”的大无畏精神，自费印刷了 500 本，在内部赠阅。卢弘先生这一壮举，可歌可泣！

写作此书，卢弘先生可以说是最恰当的人选。他有才华，有写作经验，有鲜明的爱憎，又有在军报工作近 30 年的经历。他是一名普通编辑。正因为他是远离军报权力中心的“局外人”，又离那些当权者、造反者很近，就可以“旁观者清”地了解并分析一切。加之为他平反时退回了查抄去的材料，这些材料正成为“文革”文物，使他写书时拥有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更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在晚年尽心尽力的贡

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林场所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召开了公审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着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报道。不过并未为此表示过自责和内疚，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的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不知后来刘学保本人有所悔悟没有，我只知道对刘学保等人起过煽动教唆作用的军报的那些“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至今几乎从无悔意。不仅如此，他们还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经离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过他们“教育”的刘学保之类的人物，也许正在“安度”着无期徒刑。

我写下这些，将他们的“历史功勋”立此存照。

献此书，以打破“淡化文革”的可怕氛围。卢弘先生以其生动而细致的笔触（文笔流畅，语多幽默），为我们展示了军报“文革”的波涛汹涌、曲折变化和急剧起落。军报的夺权，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其自己的个性。

报社总有不少轶事秘闻，卢弘先生对此有着真切而具体的了解。如伟大领袖毛泽东十分欣赏《毛主席语录》，命陈伯达再编一本（未果），如“砸烂总政阎王殿”是怎么提出，怎么传达，怎么实施的？谁是非党员却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张春桥是否包庇过其胞弟张秋桥（军报原副总编）？战士们给军报送大字报造反是怎么一回事，矛头指向谁？语录歌是怎么兴起的？语录操是怎么回事？“毛林并肩”的照片是如何假造出来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是谁写的？军报在宣传王杰、蔡永祥、李文忠、吕祥璧、门合、刘学保等“英雄模范人物”上造了哪些假？看起来大大揭了军报的“丑”，其实正是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为军报除去了污垢。卢先生在其大作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既非“隔靴搔痒”，又非轻描淡写，而是触及灵魂，向读者交心，因而感人至深。他虽然受了天大的冤枉，但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他说了他与肖力比较亲密的交往与对肖力的信任，也说了自己的幼稚与天真，并且总结了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生教训。我与卢先生早就相识，年龄相仿，家乡相近，经历相近，有共同语言。读了他的自责之辞，受到莫大的教益。公开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卢弘先生也是第一人（指在文坛而言）。

卢先生的大作也有缺点。写了四十多万字，没有缺点也难。我将向卢弘先生当面谈谈我的意见。撮其要者，我认为卢弘先生对林彪研究不够，对军报的“笔杆子”谴责过多，个别史实未必准确。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卢弘先生自谦地说，出此书是为了“抛砖引玉”，他希望大家“都来回忆一下”“文革”，这太有必要了。为个人计，为民族计，愿我们大家都来回顾一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能够记住历史教训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